

Chinese and Western Society & Cultural Differences

从人类构成、生存活动方式、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多个方面，
对比分析了华人与拉丁-日耳曼人社会及其文化差异。

中西方社会 及其文化差异

李家宏/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中西方社会 及其文化差异

中西 李家宏/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差异 / 李家宏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190-0762-1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文化—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4981 号

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差异

著 者: 李家宏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刘 旭

责任编辑: 李 民 王柏松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文人雅士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2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lim@clapnet.cn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0×1000 1/16

字 数: 521 千字 印 张: 31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762-1

定 价: 7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自序一 / 1

自序二 / 12

引 论 / 27

一、从人与动物的差别谈起 / 27

二、暂时处于强势的西方人如此看待东方人 / 37

第一章 东西方概念辨析 / 46

第一节 西欧与西方 / 48

一、西方社会及其流变 / 49

1. 从古希腊到泛希腊时代 / 49

2. 从古罗马到近代欧洲 / 59

二、西方社会居民的人类学特征 / 66

1. 古希腊及其以西地区的人类分布 / 66

2. 古希腊及其以西地区人类的生活习性 / 78

第二节 东亚和东方 / 93

一、东方概念下的民族多样性 / 94

1. 古希腊以东地区的人类分布 / 94



2. 亚洲蒙古利亚人种的内部差异及其分布 / 120

二、东亚华人在亚洲蒙古人种中的独特性 / 132

1. 华人在人种构成和文化上的独特性 / 132

2. 华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文化传统 / 141

第二章 东亚华人与西欧日耳曼-拉丁人的社会及其文化差异 / 155

第一节 东亚华人语境中的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 / 157

一、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话题的提出 / 159

1. 提出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话题的时代背景 / 159

2. 提出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话题的经过 / 176

二、关于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话题的主要观点 / 186

1.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观点 / 186

2. 港台及海外新儒家等学者的主要观点 / 202

3.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比较学研究 / 210

第二节 对华人与日耳曼-拉丁人的社会及其文化差异的再认识 / 224

一、中国文化与儒家文化辨析 / 226

1. 中国文化与儒家文化在内涵上的差别 / 226

2.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在农耕文明时代关涉建设“大一统”社会的行为规范及其价值体系 / 258

二、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差异 / 274

1.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落脚点在于华人与日耳曼-拉丁人的社会及其文化 / 274

2. 华人与日耳曼-拉丁人的社会及其文化差异 / 293

第三章 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

——东亚华人与西欧日耳曼-拉丁人的不同侧重 / 349

第一节 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的两种主体意识 / 350

一、关于群体意识、个体意识 / 352

1. 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概念辨析 / 352

2. 群体意识、个体意识的生发、演变 / 362

二、群体意识、个体意识在华人、日耳曼-拉丁人的不同侧重及其表现 / 378

1. 华人的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 / 378

2. 日耳曼-拉丁人的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 / 391

3. 华人与拉丁-日耳曼人社会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的不同侧重 / 410

第二节 华人与拉丁-日耳曼人社会文化互补对于新的人类文明的意义 / 428

一、华人、拉丁-日耳曼人社会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 / 429

1. 社会文化与生存生活方式的不同质性 / 429

2. 华人、拉丁-日耳曼人社会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 / 438

二、华人社会文化与拉丁-日耳曼人社会文化的交融对于新的人类文明的意义 / 448

1.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是不同社会文化相互学习、借鉴、交流、交融的结果 / 448

2. 华人社会文化与拉丁-日耳曼人社会文化的交融的进步意义 / 463

跋 / 486



自序一

(一)

西学东渐以来，直到现在，国人对待西方文明，要么顶礼膜拜，言必称欧美，视欧美为文明化身，而对华夏文明、对中国文化妄自菲薄；要么无动于衷，言必尚中国，称中国为文明渊薮，对华夏文明、对中国文化传统妄自尊大。而能够秉持客观公允态度，正视华夏文明或中国文化、尊重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主张“拿来”“以人之长补己之短”的那些极少数人，反而成为异类。这极少数人在两种极端态度的对峙、摇摆中，不仅声微言轻、无足轻重，而且两面树敌、腹背受击。

妄自菲薄的一派，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尚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底气十足、义愤填膺、义正辞严，认为所谓华夏文明是落后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农耕文明，中国传统文化是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西方的民主、自由、法律制度、科学技术才是中国实现富强、走向繁荣的不二法宝，因而对西方文明推崇备至、高谈阔论。妄自菲薄的一派，在知识分子群体占据主流。妄自尊大的一派，在甲午战争之前，还沉浸在“天朝大国”的美好回忆中，视西方文明为“奇淫巧计”而已，不屑一顾；新中国建立之后，又以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属性而极力排斥、鞭挞，将西方文明作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同义语并与之等同起来，尤其对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等主张、诉求刻意贬斥、全面抵制，将其认同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错



讹不堪；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又自我膨胀起来，我行我素，更有“不可一世”之趋向。妄自尊大的一派，在领导政治事务的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

西方文明，是指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通过工业化而得到发扬光大，由日耳曼—拉丁人创造的人类文明，亦即拉丁—日耳曼文明。由于人类的工业文明是由日耳曼—拉丁人开创、引领的，在工业化时代，日耳曼—拉丁人所开创、引领的人类工业文明便与日耳曼—拉丁人所创造的西方文明合二为一、融为一体，日耳曼—拉丁人的西方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类工业文明的最高水平，因而，人们往往将工业文明与西方文明混为一谈，俨然日耳曼—拉丁人的西方文明成为了人类工业文明的化身。在这样一种认识前提下，包括华夏文明在内的其他人类文明，便对于西方文明相形见绌，甚至自愧弗如而陷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淖不可自拔。秉持“唯西方论”态度的一派，就是将西方文明与工业文明混为一谈，认为西方文明是各民族、各个国家学习、效仿的楷模，厉声疾呼仿照日耳曼—拉丁人国家的模式构建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

华夏文明是由华夏民族创造、历经逾五千年历史而延续至今的人类文明。由于华夏民族在最近半个世纪才开始向工业化社会跃进，至今尚没有完成工业化，其绝大部分历史处在农耕文明阶段，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华夏文明，基本停滞在农耕文明的水平上，因而，任何轻视、漠视、排斥已经通过工业化而得到发扬光大、还在引领工业文明前行的西方文明的思想、观点、立场，都是极其狭隘、猥琐、错误的。固守华夏文明而自矜自伐、自以为是的一派，既没有认识到西方文明的特点、优长所在，更没有深刻认知开创、引领人类工业文明的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及其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意义，反而沉溺在华夏文明的繁盛农耕文明中不能自持，对于华夏文明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局限性、华夏文明在工业文明意义上的落后性、中国文化传统在工业文明时代的不适应性、西方文明对于华夏文明的借鉴意义惘然无知。

华夏文明、日耳曼—拉丁人的西方文明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类文明，本是由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不同类型的人类族群创造的，具有不同的特征和优长。华夏文明以其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特点，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容融、趋利避害、因势利导，更注重通过约束个人自身的行为和思想来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社会秩序，不仅创造了人类农耕文明的制高点，而且在农耕文

明时代高峰林立、层峦迭嶂；拉丁—日耳曼文明更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利用，注重个人利益的伸张，通过个人之间的相互妥协来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社会秩序，不仅开创、引领了人类的工业文明，而且其农耕文明时代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同样光彩照人、彪炳千秋。华夏文明虽然书写了人类农耕文明时代最华丽的篇章，但华夏文明并不等同于农耕文明；日耳曼—拉丁人的西方文明虽然率先创造并引领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但西方文明也不能代表工业文明。分析、比较不同的人类文明，研判华夏文明、西方文明之短长，不能以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为凭据，更不能以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定其高下。

(三)

工业文明是相对于农耕文明而言的人类文明，是工业化条件下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生活状态。工业化条件下，不仅日耳曼—拉丁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生活状态得到了巨大变革，日耳曼—拉丁人的西方文明获得了长足发展，拉丁—日耳曼文明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西方文明焕发出绚丽的光芒，而且，包括华夏民族在内的其他人类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生活状态也将发生剧烈革新，包括华夏文明在内的其他人类文明也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丰富，以新的形式、新的形象展现出来，包括华夏文明在内的其他人类文明也必将绘制出更加多姿多彩的画卷。正如手工生产条件下，包括拉丁—日耳曼文明、华夏文明在内的不同族群的所有人类文明都各各不同，都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了不同的色彩。

也就是说，不管是工业文明、农耕文明，还是后工业文明，都只是人类文明在不同阶段、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属于不分种群、不分地域、不分民族的全人类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尽管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在不同的民族还有不同表现方式的差异，但是在属性、形态上却是共通的。而由不同民族所创造的人类文明，如西方文明、华夏文明等，只属于特定的人类族群，各具特色，这些特色是不同于其他文明的根本所在。这些各具特色、属于不同民族的人类文明，汇聚在一起而共同构建、繁荣了人类文明。虽然这类人类文明在属性、形态上各各不同，但却都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有的人类文明处于农耕文明阶段，有的人类文明在农耕文明阶段便湮没了，有的人类文明一直从农耕文明阶段延续到了工业文明阶段。日耳曼—拉丁人的西方文明有其农耕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华夏民族的



华夏文明也有其农耕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的划分。

因此，将日耳曼—拉丁人的西方文明与由日耳曼—拉丁人开创、引领的工业文明混淆或相互替代，将华夏民族的华夏文明与由华夏民族所创造的最为辉煌灿烂的农耕文明混淆或相互替代，都是荒诞不经的。将尚未发展到工业文明阶段的华夏文明与已经跨入了工业文明阶段的西方文明相比较，以某一时点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判定分属于不同民族的人类文明的优劣高下，其荒谬性更加不言而喻。

(四)

然而，毕竟创造西方文明的日耳曼—拉丁人开创、引领着人类的工业文明，在工业化条件下，日耳曼—拉丁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生活状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其认知和利用客观世界及其运动规律的能力实现了巨大跃升，而且在改善自己生活、改造自己社会、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做自己社会的主人方面也都遥遥领先。也就是说，日耳曼—拉丁人创造的西方文明，由于其引领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日耳曼—拉丁人在改善自己生活、改造自己社会、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做自己社会的主人方面率先垂范，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因而，相比较包括华夏民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人类文明，西方文明蕴涵着一定的先进性、进步意义，值得包括华夏民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学习、借鉴。

西方文明在深入认知和利用客观世界及其运动规律方面，在锐意进取、开创新的人类文明方面，在改造自己社会、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做自己社会的主人方面，冠绝全球，是其他民族的榜样；西方文明对于个人权利的尊重、对于个人自由的重视、对于平等权利的强调，在全世界各民族中首屈一指，也是其他民族的楷模。因此，对西方文明置若罔闻、漠然视之，以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特殊性拒斥西方文明，秉持“唯民族论”立场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固步自封，对于其民族文化的发展、社会进步、新的文明的创造，将造成巨大的障碍并形成致命的危害。

但是，西方文明又毕竟是日耳曼—拉丁人创造的人类文明，是具有日耳曼—拉丁人属性的人类文明，是以日耳曼—拉丁人的生存生活方式、生活习性、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为支撑的人类文明，是具有日耳曼—拉丁人生活习性、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特色的人类文明。因此，奉西方文

明为正朔，忽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以日耳曼—拉丁人的生存生活方式、生活习性、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来改造自己民族的生存生活方式、生活习性、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这种行为、主张、观念无异于削足适履、杀头便冠。

(五)

不同的人类文明，都是由一定的民族文化支撑起来的。一方面，包括华夏文明、西方文明在内的属于不同民族的人类文明，具有一定的民族文化背景，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一方面，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等不同阶段、处于不同层面的人类文明，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影响，受制于一定的民族文化。

例如，华夏民族擅于形象思维、强调趋利避害、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热衷于满足现实生活需要，而日耳曼—拉丁人则擅于抽象思维、甘于冷静孤寂、热衷于征服客观世界、执着于个人兴趣。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特质，造就了华夏文明、西方文明的显著不同。民族文化差异造成了建基其上的人类文明的迥然各异，不仅在相同的文明阶段，其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生活状态具有不同的表现，而且，对于不同的人类文明，其贡献也大为殊异。同在农耕文明阶段，华夏民族的政治经济生活呈现的是君主专制之下的“大一统”形式，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地主经济特色凸显；日耳曼—拉丁民族的政治经济生活则是诸侯林立的“封建”形式，同阶层的人与人之间平等，不同阶层之间等级差异显著，庄园经济盛行。同在工业文明时代，日耳曼—拉丁民族盛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包括华夏民族在内的亚洲东部各民族则强调国家管理、政府调控之下的有序发展。

由于华夏民族擅于形象思维、强调趋利避害、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热衷于满足现实生活需要的文化特质适宜农业生产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农耕文明的创造，因而，华夏民族创造了人类农耕文明时代的累累硕果，维系了最高水平、最悠久历史的人类农耕文明，华夏文明的农耕文明时代得以不断延续。但是，在工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创新对于文明水平的提升、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越来越举足轻重，工业文明时代的新产品的创世、新的生产技术的突破、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创设，完全依托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新的发明创造的出现、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华夏民族的文化特质对于科学研究突破、新的生产技术开创、新的科



技产品创造、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创设不擅专长，因而，华夏民族对于工业文明的开创、引领，鲜有作为，只能步人后尘亦步亦趋。然而，擅于抽象思维、甘于冷静孤寂、热衷于征服客观世界、执着于个人兴趣的日耳曼—拉丁民族却在工业文明时代有了“英雄用武之地”，其文化特质适宜工业文明的创造，因而率先开创了人类的工业文明，并且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引领着人类工业文明的继续前行。

华夏文明、拉丁—日耳曼文明之间的大相径庭，华夏民族能够维系最长久的人类农耕文明时代、创造最灿烂辉煌的人类农耕文明，日耳曼—拉丁民族能够率先开创人类的工业文明、引领人类工业文明的进步，盖缘于其文化特质。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化特质，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生活状态，适应性不同；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生活状态，表现也有所不同。因此，才会出现“时而东风压倒西方，时而西方压倒东风”的历史境况。

(六)

不管是农耕文明，还是工业文明，都不是人类文明的最后阶段和最高阶段；不管是农耕文明，还是工业文明，都只是人类文明较初阶段、较低水平的表现形式，都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因此，不管是华夏民族，还是日耳曼—拉丁民族，还是其他民族，都不能以自己民族在某个时期、某个阶段处于先进地位而妄自尊大、自矜自伐，鄙视、挾伐落后民族，也不能以自己民族在某个时期、某个阶段处于落后地位而妄自菲薄、自暴自弃，漠视、诅咒自己民族，更不能对自己民族的落后地位熟视无睹而自以为是，仇视、对抗先进民族及其文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

农耕文明阶段，人类文明仅仅停留在顺应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及其运动规律趋利避害而改造自己生活、改善自己的生存生活条件的水平上，还不能利用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及其运动规律大规模地创造新的生产生活资料改造自己生活、改造自己社会，还匍匐在客观世界及其运动规律的驱动、支配、奴役之下不能自己。工业文明阶段，人类文明虽然进步到了利用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及其运动规律大规模地创造新的生产生活资料改造自己生活、改造自己社会的高度，但是，人类对于自己本能、自己社会及其运动规律还无动于衷，不仅受到自己本能、自己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驱动、支配、奴役，还是自己本能、自己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顺从的奴仆”，而且，对于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及其运动规律的认知和利用水平也还处于较低级的阶段，既有竭泽而

渔、焚林而猎的胡作非为，同时还有对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及其运动规律的相当无知、相当无奈。对环境的恣意的破坏、对自然界的无谓的索取、单向度的制造，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剑拔弩张，便是工业文明阶段的人类文明的局限性的表现。更高水平、更高层级的人类文明，是人类对于包括自己、自己社会在内的客观世界及其运动规律的普遍自觉，人类不仅能够趋利避害，能够利用规律改造自己生活、改造自己社会，而且在包括自己、自己社会在内的客观世界及其运动规律面前表现出充分的自由性、主动性，已然成为真正的自己生活的主人、自己社会的主人、自然界与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实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自由发展。

更高水平、更高层级的人类文明，一方面，需要各个民族对于包括自己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在内的人类自身、自身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深入认知、充分自觉；一方面，需要不分地域、不分民族的全人类的相互协助、共同努力、共同进步，需要不同民族的不同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补益，不断地提升各自的生产生活水平，不断地改善、创新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生活状态。民族文化作为人类自身、自身社会的客观存在，是人类改造自己生活、改造自己社会、做自己社会的主人、做自然界与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而必须深刻认知并加以利用的对象，是人类自身、自身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重要构成，对于人类改造自己生活、改造自己社会、做自己社会的主人、做自然界与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充分认知不同民族的文化以及建基不同民族文化之上的人类文明，对于新的人类文明的创造，意义非凡。

华夏民族、日耳曼—拉丁民族作为人类社会的两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族群，不仅其生存生活方式、生活习性、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囊括在华夏文化、西方文化的主题之下得到了集中反映，而且，这两个人类族群所创造的华夏文明、西方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也具有典范意义。对深潜其中的作为华夏文明、西方文明基质的华夏文化、西方文化的研究，既是人类认知和利用自身、自身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人类认知和利用自身、自身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重大课题。

(七)

对华夏文化、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中华民族落后于欧洲列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背景下进行的，是中华帝国经鸦片战争而由“天朝大



国”沦为任人宰割、丧失国家主权的半殖民地之后，不得不正视来自西方的侵略者，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立足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而主动开展的。

对华夏文化、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是最近 150 年之内的事情，是以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形式和方式开展的。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由中国知识分子掀起、参与，研究者还局限于中国学术界，理所当然地，这种比较研究立足于中国立场、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带有显著的中国化的特点。

比较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系统研究，以清末民初的辜鸿铭为嚆矢，其《中国人的精神》不仅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而且将其作为解决欧洲社会危机的“解药”重磅推出，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首开先河。其后，以梁漱溟、钱穆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孜孜矻矻发掘中国文化的精髓、揭橥中国文化的社会价值，深入研究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差异，对于中西方社会、中西方社会文化及其差异的比较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建立后，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港澳台地区，但其研究重心也偏向了复兴儒学的路径。改革开放之后，关于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比较研究再次勃兴，述说纷纭，而且，关于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还作为专业课程登上了大学课堂，但是，这些研究却往往流于“一窝风”，尽管其间为提供专业课教材而出版了一系列具有系统化特征的研究成果。而且，关于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以中西方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的具体分析为内容成为文学、艺术、哲学专业学生的研究课题。风潮过后，风静行止，罕见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问世。

关于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一部分坚守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在“全盘西化”的狂涛中岿然独立、杜绝随波逐流而冷静、理性的思索、分析，是少数有思想、有见地、有境界的民族精英的思维活动。能够坚守中国文化、致力于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比较研究的知识分子，才是中国文化得以赓续延绵、中华文明得到不断发扬光大的经脉所在，是中华民族的精髓、魂灵。虽然这个群体的人数极少，但在全民族的妄自菲薄狂浪中，这部分人的坚守以及他们的思考、研究，更显难能可贵，也方显“英雄”本色。

(八)

实际上，所谓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是一个不够严谨的命题或表述，不符合学理的规范。

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其所指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与西方社会、西方文化。然而，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都病于内涵模糊、外延宽泛，而且，比较双方的内涵、外延具有不对等性。其一，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以中国为前置条件，是以一个国家为落脚点的，而西方社会与西方文化却是以“西方”这个地区为支撑，是以一片地域为讨论对象。将一个国家与包涵许多国家的一片地区比较，二者的设置前提不对等，难免“关公战秦琼”之殇。其二，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其历史具有阶段性，其疆域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其人口的构成更是复杂多样，许多不同的民族之间缺乏文化的同质性，比如中国的藏民族、穆斯林、汉民族之间，文化差异巨大。我们到目前为止的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都是以汉文化替代中国文化的，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的藏文化、穆斯林文化等并不包涵在内。而西方作为一个地区，不仅其历史是连续不断的，该地域内陆续建立了众多的国家、生存活动着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分分合合，有的消逝了，有的又新生出来，而且，西方这个概念还有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方面的所指，即使以文化上的以古希腊文明的传承来理解西方，如今的希腊、马其顿等民族国家却不在文化西方的范畴之中。因此，关于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比较，不仅存在着前提错误，而且概念不清。

(九)

所谓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比较，实际是在中国落后于引领工业文明的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前提下，对经济、科技落后的中国与经济、科技发达的西欧国家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对比分析，是在经济、科技落后条件下对民族文化价值的据理力争，是对民族文化价值的积极肯定、深入挖掘。

关于社会文化的比较，须立足于一定的社群范围，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社群的历史、地理、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等等方面的综合比较、对比分析。中国是一个“大一统”国家，虽然其中的民族文化差异巨大，但汉民族与汉少数民族作为其构成主体，这些民族的文化具有同质性，在中国文化中也占据着主流、具有代表性。而西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是同一类民族建立的国家，这些民族国家的构成主体具有同质性，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以及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因而，关于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比较，实际就是近现代中国的构成



主体的汉民族、汉化民族的社会及其文化与近现代的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构成主体的日耳曼—拉丁民族的社会及其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

将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比较，落脚在汉民族、汉化民族与日耳曼民族、拉丁民族的社会及其文化的比较，即华人社会与拉丁—日耳曼人社会及其文化的比较，更加准确，更具指对性，也更能经得起推敲。

(十)

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中，还有一种以儒家文化替代中国文化的倾向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仁”、“礼”为思想核心，主张天下一统、尊卑有序、王者为政以德、臣民讲信修睦的文化派别，提倡通过教化的途径来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自律。儒家文化以公元前 5、6 世纪的春秋时期的孔丘所创儒家学说为起源和理论基础，经过后世历代学者的补充、发扬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时间长达两千多年，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华人族群的行为和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社会风尚的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尽管儒家学说、儒家思想自公元前 2 世纪末期的西汉武帝时期以来在中国社会获取了正统、主流的地位，一直在中国人的社会、政治乃至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主流，但是，儒家文化也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概括、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内容。不仅儒家文化只是汉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中国文化在汉文化之外还有包涵有其他诸多民族的文化，而且，汉文化中还有道、墨、法、阴阳、佛等流派的理论、思想、主张，更有包括饮食、服饰、婚丧嫁娶的民俗等等内容在内的构成。中国文化是中国的历史、地理或是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的综合。中国人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远远不是以儒家的理论、思想、主张为唯一的表现形式的。而且，儒家文化还只是华夏民族在农耕文明时代的生活习性、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阶段性表达。随着农耕文明时代的渐行渐远，以维护尊卑等级差异为要旨的儒家学说、儒家思想的历史尘封，成为必然。

(十一)

选择开创了人类工业文明并还在继续引领人类工业文明进步的日耳曼—拉丁人社会及其文化与华人社会及其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是分析华夏民族在工业文明时代落后的根本原因，正视差距，寻找自身的不足；一方面，在对比分析中，对华夏民族自身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和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更加全面、更加清晰的认识；同时，对处于先进地位的日耳曼—拉丁民族也进行充分的了解，进行全面、客观的认知。通过比较研究而对华人社会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剖析，以达到充分、深入了解自己的目的，为中华民族自觉于自己的民族性格、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做自己社会的主人、做自然界与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创造条件；为中华民族的率先觉悟、开创和引领新的人类文明，积极预备。

擅于形象思维、强调趋利避害、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热衷于满足现实生活需要，是华夏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特点；个体意识淡漠、沉溺于群体内部利益的争斗、缺乏开拓创新精神，也是华夏民族的性格缺陷。由于民族性格、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是不同的人类族群在长期的进化中逐渐成型的，是不同的人类族群在适应一定的生存生活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塑造的，因而，这些民族性格、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并没有对错、优劣之分。但是，一定的民族性格、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对于不同人类文明的创造，却有着背顺之异。因此，只有充分了解这些民族性格、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了深刻的认知，自觉于自己民族的性格、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才谈得上改造自己生活、改造自己社会、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做自己社会的主人、做自然界与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

著者作为华夏民族一分子，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对待问题的态度、方式、角度，不可避免地带着本民族的重于形象思维、强调趋利避害、主张人与客观世界和谐相处、服务于满足现实生活需要目的的色彩；而且，重论述、轻论证。这是本著的特点，也是本著的缺点。按学术著作的国际标准衡量，本著在论述、论证中没有大量地引经据典、广博索引，欠缺参考文献、人名地名和词汇索引的详细罗列，显得谨严不足、率滑有余，俱当引以为戒。

2015年3月